



# 幽径春生豆蔻长

□肖复兴

我第一次看到《人民文学》这本杂志，是1961年的秋天，那时我读初二。班上的一个同学知道我爱看书，好心从他家拿来两本借我，一本是清末民初出版的老书《千家诗》，一本便是《人民文学》。

杂志也是旧的，纸质发黄，封面都卷了角，是1956年第8期的《人民文学》。这期杂志上其他作者和文章统统忘记了，只记得一篇小说《三月雪》，作者叫萧平。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大多数作家都赫赫有名，耳熟能详，这个萧平，在当时对于我很陌生。但这篇小说给我的印象很深，讲述战争年代一个区委书记与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和她妈妈的故事。与同时代同样书写战争小说的写法不尽相同，萧平把战争推向背景，把更多的笔墨落在战争中的人性和人情之处；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中的微妙有机地调和在一起。浸透着战争的血痕，同时又盛开着浓郁花香的三月雪，可以说是萧平小说显著的意象或者象征，可谓一半是火，一半是花。

正值青春期，小轩惹人丁香结，幽静春生豆蔻梢，那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和她牺牲的妈妈，让我感动，让我难忘。我很喜欢这篇小说，将第一节开头的：“日记本里夹着一枝干枯了的、洁白的花。他轻轻掀起那枝花，凝视着，在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棵迎着早春飘散着浓郁的香气的三月雪，苍郁的松树，松林里的烈士墓……”抄录在笔记本上。如今，58年过去了，这个笔记本还在，我幼稚的字迹还在，《人民文学》留在我14岁的记忆里。那时候的《人民文学》和我一样正值豆蔻年华，青春年少。

我知道的《人民文学》里的第一位编辑是崔道怡。那是我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买了一本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队员的道路》，封面上印着

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少年的侧影，还印着作者的名字：崔道怡。这本书很薄，但我很喜欢读，是我最早读到的儿童小说之一。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在我高三毕业后后的一个冬天，又看到一篇小说《过客》，作者也是这个名字：崔道怡。我显得很兴奋，仿佛他乡遇故知。其实，当时我根本没有见过他。

1974年的春天，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一所中学里教书。没课的时候，我去去学校图书馆翻书，从墙角堆放的几个大麻袋里，翻出一套《人民文学》的合订本，是用粗粗的麻线人工装订的，像刺猬一样在麻袋里蜷缩委屈得年头太久，已经破烂不堪，连最上面一期的封面都没有了。而且，也不是按照出版的年月装订的，锣齐鼓不齐的，把现有的《人民文学》都弄在一起，囫圇个儿的装订一起。负责图书馆的老师见我蹲在地上翻个没完，一摆手，让我拿走。这厚厚一摞《人民文学》，成为我那时候学习写小说的范本，印象最深的是方之的一篇《岁交春》。对比流行于“文革”期间的小说，这篇充满诗意的小说写法别致，让我耳目一新；而且，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岁交春，百年一遇，那样难得。还有一篇小说《圣女宫》，一看作者是萧平，更像见到了童年时代的朋友一样格外兴奋。

1978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上，刊发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玉雕记》，那是邮寄到编辑部的自由来稿，信封上只写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收”，连一张4分钱的邮票都不用贴，竟然就寄到了，还发表了。那时候，我连《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从自由来稿中发现这篇小说的编辑是许以前辈，我从来没有见过。《玉雕记》的这个名字就是她帮助改的，原来我写的小说题目叫《一件精致的玉雕》，显然，不如

《玉雕记》精练，更像小说的名字。

以后，每期《人民文学》杂志，我都会收到，我不知道是谁定下的，又是谁帮我寄出的，我只是感到温暖。一直到1997年底，我从《小说选刊》调入《人民文学》杂志。命运浮沉，岁月更迭，我居然进入《人民文学》的大门，成为《人民文学》中的一员，并一直在那里工作到退休。

记得第一天来到《人民文学》，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我和崔道怡坐对桌，我对他说起当年读他的小说《队员的道路》和《过客》的往事，又向他讲起了关于《玉雕记》的往事，向他打听刊发我这篇《玉雕记》的编辑是谁。他是当时《人民文学》资格最老的老人，是《人民文学》历史上的一本活字典。他想了想，对我说：应该是许以，当时她负责小说。

一切关于我和《人民文学》的往事，在《人民文学》跌宕而漫长的历史中，算不得什么，微弱得只是时光荡起的些许涟漪。但是，坐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室里，重温这些往事，便显得那样亲近，触手可摸，含温带热。

那一天，我感到命运中确实是有着缘分存在的。我想起了读初二那一年的秋天，第一次见到《人民文学》杂志的情景，那时候，觉得《人民文学》高深莫测，侯门一去深似海。如今，我从她的读者，到她的作者，又成为她的编者，完成了我人生的“三级跳”。我真的感到冥冥命运中不可测的神奇。

如果从初二我第一次见到《人民文学》算起，我和《人民文学》有着长达58年时间的交织。今年，是《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在这70年的历史中，也有我的58年，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如今，我老了，而她不老，会永远年轻。祝福《人民文学》！

# 不断开拓新的文学空间

□梁鸿

2010年9月的某一天，《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老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梁庄》在杂志第9期发表之后，有很多读者给他写信、发短信或打电话。他非常意外，很久以来，文学很难激起读者如此大的反应了，杂志也好久没有因为发了一篇文章而如此热闹。

之后而来的一切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在车站了，看完《梁庄》，他要回自己的家乡看看。我开始陆续接到读者来信、微博私信留言、辗转打来的电话，这些人中有退休官员、在职县长、普通城市居民、农民打工者，等等，都是素不相识的人。其中，一个天津的出租车司机辗转给我打通电话，说他一定要告诉我，我写的就是他的村庄，他要谢谢我。紧接着，各类媒体，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来联系采访。2010年结束后，因为《梁庄》，我又得了一些奖项。

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文学》杂志一直在跟进。2010年10月，《人民文学》杂志召开一个研讨会“非虚构：新的文学可能性”，讨论《梁庄》以及《中国，少了一味药》（慕容雪村）、《南方词典》（司马相风）等文本的特点，讨论“非虚构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可能性和方向。在这次研讨会上，《人民文学》又启动了名为“人民大地 行动者”非虚构写作的计划，拿出资助资金，吁请海内外作家和写作者，走出书斋，走向“吾国吾民”的生活现场，探索田野和都市，以行动介入生活，以写作见证时代。

在这一倡导中，我又开始了新的准备和调查。这一次，我沿着梁庄人在城市打工的足迹，跑了二十几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至少在当地停留10天左右，并且尽可能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工作。这样下来，前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做调查，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作，最后，以《梁庄在中国》之名发表于《人民文学》2012年12期（单行本时改为《出梁庄记》）。

好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燃点，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我顶着“非虚构作家”之名进入文坛，并且在持续“行走”的过程中，获得极大的力量和思考的动力。但是仔细想来，如果没有《人民文学》的持续推进，如果没有《人民文学》一系列研讨、命名和活动，可能《梁庄》就不会得到那么多持续的关注，可能就不会有接下来《出梁庄记》的写作，更重要的是，我个人的文学结构、心灵状态就不会有如此深刻的变化。

说实话，写作“梁庄”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非虚构”这一概念，更不知道《人民文学》杂志开办了这一栏目。当我把稿子给李敬泽老师时，我并不知道这篇稿子放在什么地方更合适，我没有任何的预设。但我内心清楚，它肯定不是小说，好像也不太像通常的散文或者别的传统文体。我没有给《梁庄》归类，我只是按照我写作时所想到的最好形式把它写出来。

当“非虚构”这一命名和“梁庄”之间产生关联和对应时，突然间，就好像旧颜换新貌，新的意义和空间产生了。这就好像是T.S.艾略特所言的“化合作用”，概念彰显了文本内部所蕴藏的空间，反过来，文本为概念提供了可靠的阐释内容，两者互相照亮，照出了一个新的空间和可能性。在“非虚构”这一“新的写作观念、伦理和写作方式”（李敬泽语），“梁庄”那样危险的写法变得有所倚靠，而文本中对当代乡村生活的真实呈现也找到了恰当的命名。“梁庄”里面的“真实”和“非虚构”这一概念放置在一起时，读者内心的缺失得到了某种确证和回应：他们渴望在混沌、复杂的中国当代生活中找到某种真相，渴望能够有什么东西呼应他们内心的忧伤——时代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整体失落和某种说不清楚的晃动之感。

与此同时，因为“非虚构”概念的出现，“虚构”作为一个概念和文体也被重新思考。并非是谁高谁下、谁优谁劣，而是在相互观照、较量和相互思辨、确证的过程中，双方都得到新的发展。换句话说，它也激活了“虚构文学”的内在机制。

一本好的文学期刊和作家之间是相互生长、彼此激发的关系。它会不断开拓新的文学空间，让作家重新思考写作的意义和写作的方向。在此意义上，《人民文学》杂志引领、甚至可以说是创造了一种文学形态，使当代文坛形成新的格局和风貌。毫无疑问，这是《人民文学》杂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贡献。

就我本人而言，正是《人民文学》最初的鼓励和指引，让我成为一名文学的“行动者”，并且因为能够行走在“大地”，能够感知到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而无限幸运。



2016年第9期《封面》插图 陈新民作



2019年第6期《攀登者》插图 陈新民作



2016年第6期《蜻蜓眼》插图 李焰戈作

# 很幸运，我遇见了《人民文学》

□庞羽

从小学，《人民文学》就是我心中的文学高原。父亲订了许多文学杂志，年幼的我也会看一看。我也看过《人民文学》，我觉得那里面都是宝藏。那时我难以想象，我与《人民文学》还会有更深的缘结。

在北大读大三时，我开始了我的小说创作。那时，我对于小说并没有什么清晰、准确的理解，我只是想把我想到的情节写下来。我有许多想法，有的想法还会吓自己一跳。我还不怎么懂投稿，于是上网搜索杂志邮箱。我将写的几篇小说投了出去，包括那篇《佛罗伦萨的狗》。后来有了出人意料的结果，那时我还不敢想象，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能登上我敬仰的《人民文学》？

然而命运的齿轮一直在转动。我那篇《佛罗伦萨的狗》获得了第四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听到消息时，我的感受是震惊。小说也可以这么写？小说这么写可以写得好？我怀着这些困惑参加了颁奖仪式。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隆重的场合，很惶恐，也很快乐。我第一次见到了各位老师、伙伴们，我知道，我不是孤单的。后来我取得的小小成绩，都与写作之初受到的鼓励有很大关系。2017年，我的小说《一只胳膊的拳击》登上了梦寐以求的《人民文学》。一个傍晚，《人民文学》微信公众号推出了我的小说选读、创作谈、印象记以及小说评论，那是一个年轻小说家的“高光时刻”，也是属于所有小说家的创作的甜蜜。这篇小说的名字成了我后来第一本书的名字。我感到我的文学之路，又多了一个照明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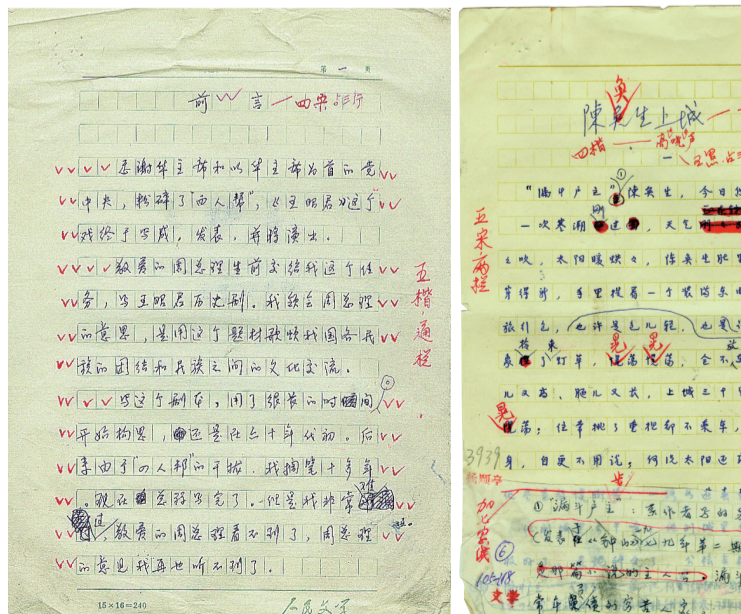
2017年还有一件喜事。我的小说集《我们驰骋的悲怆》入选了“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7年卷。更令我激动的是，《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老师为我这本书作了序。施老师在序言中说：“遇水而伸，藤蔓枝条的生长性想象，让庞羽在故乡的基层上发达着文学脚力，继而不断展开经历而自然产生的方位挪移，随经验而蓬勃飞行的视野扩容。她像一个力大无穷的仙子，向人性和社会深不见底的湖中，扔进了叫做小说的铁船。”2017年，我正在靖江的基层马桥镇挂职锻炼，每天穿梭于尘土弥漫的乡间马路，接待与走访基层百姓，积累了很多生活知识。我还在村里待过半个月，看管农田，实行“秸秆禁烧”计划。这是很难得的经验，这些经验不断磨练着我的“文学脚力”，也扩展了我的视野与胸怀。我知道，那时对于各位文学前辈而言，我还很稚嫩，需要更多的人生阅历。但施老师为我写的书序，极大地激励了我。他为我插上了一双翅膀，让我更加从容地翱翔在文学的天空上。

2018年9月，受《人民文学》的邀请，我来绍兴参加了“2018绍兴文学周·第五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与会者有施战军、邱华栋等老师，同时还见到了我的“文学网友”们：李唐、王苏辛、宋阿曼、郑在欢、小托夫等等。这是我第三次来到鲁迅的故乡，然而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感受。这次会议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我们走在绍兴的道路上，我还和阿曼去了鲁迅故居，吃了臭豆腐、冰淇淋。到了晚上，李壮老师还带我们去绍兴黄酒。回来的路上，下起了小雨。我突然就想到了闰土。他看过了多少故园的秋雨，才甘愿低下嗓子，叫一声“老爷”？我们无从得知，却能真切感受他的想法。在会议上，我们学到了很多。更难忘的却是会议之后，我们坐在宾馆的沙发上，玩起了“狼人杀”游戏。文学之路艰苦，而正因有了这些老师和同路的朋友们，它才有了令人激动的熠熠光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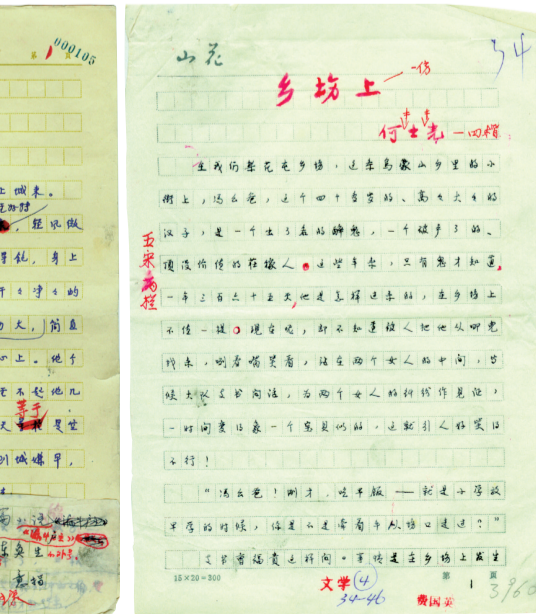
到了今年，我收到了一本意义非凡的书：一本德文版的《人民文学》。这本《人民文学》德文版收录了我的小说《佛罗伦萨的狗》。这篇小说是我创作的起点，如今被翻译成了德文，这又是一记响亮的击掌：我与文学击掌，我与《人民文学》击掌。这本《人民文学》德文版至今都放在我的床头柜上。虽然我看不懂里面的文字，但它给了我异常坚定的力量。我看着我那几个拼音字母“Pangyu”，决心要让它出现得更频繁、更响亮。这是一个小说家应该做的，这也是一个备受鼓励的创作者必须做的。

今年9月份，我的小说再次登上了《人民文学》杂志。这篇小说叫做《白猫一闪》，灵感源自于我租的房子旁的电梯，那里堆积着一些杂物垃圾。有一天，我路过它时，问了自己：它们也曾有自己的价值，被别人所珍惜，如今却只有在这里忍受寂寞，等待消失。难道历史不是这样吗？岁月里的一切东西，美人、华服，哪怕妈妈做的一顿饭，最后都是如此。难道这不就是一篇小说的主题吗？后来，我就写了这篇《白猫一闪》，投给了责编梁豪老师。这篇小说很快就定下来了，发在了《人民文学》2019年第9期。还有读者看了这篇小说后，与我谈了很久。这位读者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解读，我很感动。这是对作家最好的褒奖。翻阅着《人民文学》样刊，属于一个作家的甜蜜再一次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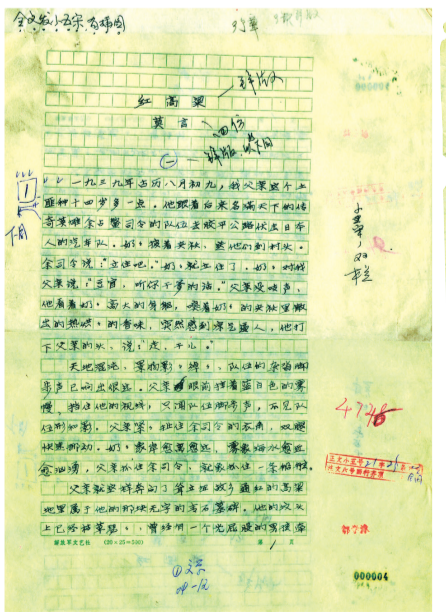
我非常感谢《人民文学》，它给了一个作家勇气与自信。对于作家而言，勇气能让他写下去，而自信能让他继续写下去。这是最宝贵的东西，既需要作家自己成长，也需要外界的支持与帮助。在这光芒满天的时刻，我想祝《人民文学》：生日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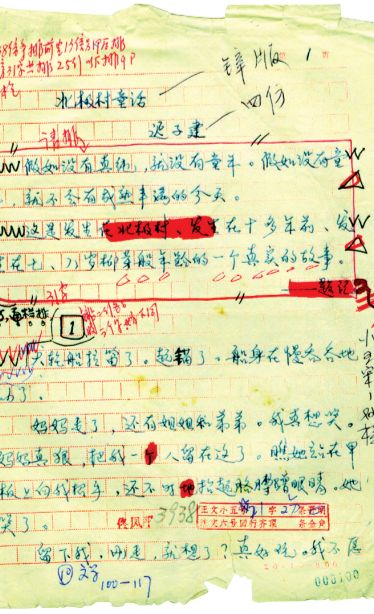
曹禺《王昭君》编辑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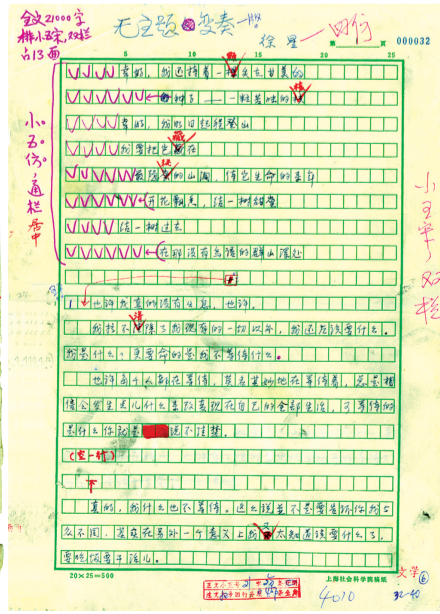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编辑手稿



莫言《红高粱》编辑手稿



迟子建《北极村童话》编辑手稿



徐星《无主题变奏》编辑手稿